

青观察

“便利店文学”

与无穷的远方、无数的人们隔空对话

张雪妍



2026年初，作家刘震云在自己老家河南的便利店开辟出了一块“文学角”，他在一个小黑板上写下了一句话：“街上走着的每个人，大家都辛苦了。”

当文学遇见便利店，首先意味着一个由“效率”定义的空间场景被重新发现。便利店是当代都市生活节奏的典型切片，服务于快、即时，以满足“快消”的姿态，回应着分秒必争的焦虑。

正如人类学家项飙所说的，我们正经历着“消失的附近”。这并非简单的邻里疏离，而是一种感知结构的断裂：现代人往往困于极度的自我关注与对宏大世界的粗糙想象之间，却丧失了对具体、鲜活的“中间层次”的感知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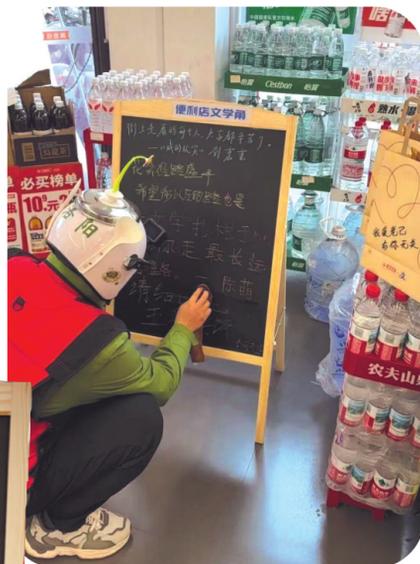
们日复一日熟练地拿起相同的三明治，却很难记住店员的姓名。

“便利店文学”的出现，恰恰是在看似缺席的“附近”，以去神圣化的松弛感发现具体的他人，用朴素的语言建立起久违的微弱联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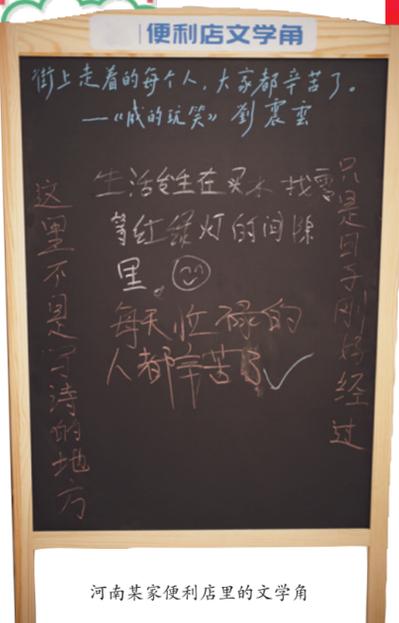
为何这块小小的黑板又能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？“便利店文学”依靠路人自发的接龙，得到了更具公共性意义上的“延展”。这并非社交媒体上算法推荐下的虚拟互动，也不是文艺沙龙里精心修饰的言辞交换。

这种互动也反映了当代人对于“活人感”的渴望。在社交媒体上，人们的交流往往被各种滤镜和标签所掩盖，真实的自我被隐藏在虚拟的形象背后。

当然，我们在注视“便利店文学”时，也要保持一份必要的清醒，避免将其过度浪漫化。从那些曾被诟病为俗套的“我在XX很想你”“想你的风吹到了xx”路牌，到街边小馆遍布角落的留言墙，其中随处可见普通人真情实感的冲天一喊，也不乏对某种情感机制加以包装引流的商业运作。



路过的外卖员在便利店的黑板上留言



河南某家便利店里的文学角

媒体能有一定的扩散，但因为缺乏有效的转化机制，或许也难以成为流行一时的噱头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不能忽视“便利店文学”所承载的朴素价值。

而是让书写自然地渗入日常，使那些原本与创作无关的普通人能在驻足的片刻，完成一次真诚的表达。其实，类似的场景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鲜见。如果说“便利店文学”是城市群落中特有的微光，那么在更广阔的版图上，发生在县城广告牌、乡镇小卖部、绿皮火车车厢、村广场黑板上的故事，或许无时无刻不在上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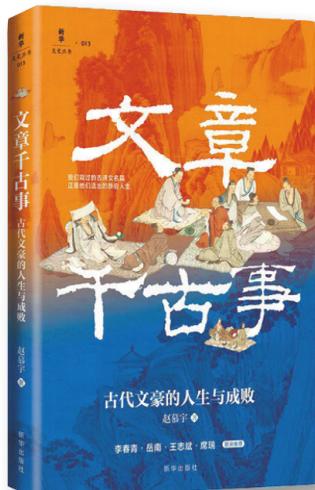
“便利店文学”的出现也为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和思路，提醒着我们“便利店空间”与文学的更多可能：文学与大众的联结，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或昂贵的门票，它是我们固有的情感本能，只是换了一副面孔，藏进了烟火人间的深处。

(作者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编辑)

青推荐

以文史为镜，照见古今智慧

罗 帅



《文章千古事：古代文豪的人生与成败》，赵慕宇著，新华出版社，2025年12月

的写法即符合此论。作者依托史实，钻研各路材料，手持放大镜观察每粒“文史水滴”，于方寸间见全宇宙，论述出人意料又让人信服。

《曹操：九死一生征北路》一节主要品读《观沧海》与《龟虽寿》两首诗，但作者笔力重心并未直接落到诗歌文本，而是荡开一笔，从曹操写作两首诗前夕征讨乌丸说起，再到下战书、定奇袭、遭遇战、陷阵营、斩乌丸，重现曹操平定北方之惊险，并井有条，细节充沛。充分“造势”后，再评点《观沧海》，就能顺理成章得出“诗作气度恢宏”这一结论。

窥一斑而知全豹，不仅要求论者以单篇史书和文学文本为基，同时还要求借助相关文献，旁征博引，深挖一字一句，言之有物的同时言之有据。《项羽：事先张扬的谋杀案》重释鸿门宴，围绕《史记》对鸿门宴的记载，联系前后巨鹿之战、火烧阿房、封邦建国等事件中项羽的情感、心理、认知和行为，认为其并非奸谋无断，也不真想置刘邦于死地，只是设计了一场针对刘邦的服从性测试，项伯、项庄、范增、樊哙都是插曲；其最终失败，恰因内心深处刚愎自用，决断时意气用事，因小失大。历史层积岩中少有人留意的细节由此浮出地表，勾勒出了项羽的另一副面孔。

一如刘勰所言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”（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），在赵慕宇眼中，文学文本皆非孤立，而承载了创作者的经验 and 心血，也浓缩了历史事件和时代风气；反过来，历史和时代则依托史书、辞章等留下印痕，从而有章可循，可谓“文本中有历史，历史中有文本”。文学作品在保留其审美、虚构等特质的前提下，灌注了作家生平、人情风俗和时代文化，内涵得到扩充；历史在保持真实客观的同时，外延也得以扩大，诗词歌赋都可作史材。

《陶渊明：暗恋桃花源》考证桃花源的原型及《桃花源记》的生成，从魏晋流行的“类桃花源”传说入手，说到陶渊明痴迷志人志怪故事，同时考虑纷飞战火与民众避乱需求，最终推断《桃花源记》之成文乃以上三者共同结果，该文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魏晋世风和时变。这种研究思路一方面受陈寅恪桃花源研究启示，另一方面则借“文化诗学”予以拓展，将陶渊明阅读搜辑“怪力乱神”的兴趣纳入考量，笔墨重心从实证移向语境考察，强化了文本与历史的互动，使传统文史互证更为灵活。

赵慕宇坦言，写作此书是站在今天与古人对话，也是在知识爆炸的AI时代寻觅和分享智慧。在我看来，他能在繁重的工作之外，扎实认真地思考与写作，本身就是一种对抗浮躁与功利的尝试。这大抵也是他从古人身上学到的智慧。智慧寓于知识，更潜藏在渴望知识、获取知识、交流知识的途中。正所谓“纸上功夫心上磨”，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是接近智慧；暂时悬置稻粱，远离烦琐职场，一头撞向文史群星，与之对话，则是切实寻找智慧。

(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)

用文字寻找认真生活的可能

——《西西里岛的一个晚上》读札

张 佳

来自北京的大学生江南，到西北山区平泉县支教。批阅作业时，这个在城市长大的女孩被一个叫陈羌君的学生“冒犯”。她感到委屈和愤怒，想要声色俱厉地批评，可最后只说出一些劝诫的话。

这是收录在小说集《西西里岛的一个晚上》里的小说《将军梦》讲述的故事。行文至此，我们可以推测，后续情节大概是师生间的一波三折，这个叫陈羌君的西北男孩将再次被老师打动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小说随后搁置了陈羌君的线索，转而叙述江南与学生薇薇的交往，以及与平泉县的告别。那么，作者为什么这样处理呢？这或许是打开《西西里岛的一个晚上》的关键。

《西西里岛的一个晚上》是清华大学“朱自清文学奖”获奖作品的选集，收录了16篇获奖小说。这些小说的作者大多是“95后”甚至“00后”的学生，在文学想象与命运书写外，这些作品又给我们带来了当下写作所罕有的温柔与真切，情感充盈并超越了故事，成为小说表达的核心。

例如在《将军梦》里，作者庞晓畅生动地描绘了江南这个城市女孩对西北方言的感受、批评学生时泄气、学生改变后的幸福感，以及再度失望的灰心意冷。与其说小说是为塑造陈羌君的成长，毋宁说，是在表现一个在城市长大、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面对西北县城时的诧异和无助。故事结尾，江南回到北京，回到她光鲜亮丽的生活。这篇第三人称叙事的作品，用一段倾泻般的口吻表现这种对照带来的情感冲击：

这里离北京太远了，远到似乎可



《西西里岛的一个晚上》，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社编选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25年10月

有可无。这里离书上说的建功立业也太远了，上次有人在这里建功立业还是在公元1364年，留下地图上一个小小的点，荒漠里一块小小的碑。这些破碎的、贫困的、颠沛流离的家庭之中走出来的孩子也曾被叫作我们的花朵。可是，可是。

在这里，主体性超越他者的故事，成为小说更重要的存在。这同样也出现在祝源铨的《河流》中。故事开篇于“我”参加儿时朋友杜鑫的葬礼，转而回忆二人与女孩依依的交往。围绕依依父亲王峰的死，小说设置了悬疑结构，在不同时序的线索里，寻找过去的友谊和生活。暑假的电子游戏、古马河的暴雨、朋友间的分歧，以及许许多多与谜题不相关的其他村民的故事。小说看似处理死亡的主题，但无论杜鑫还是王峰，仅仅作为记忆的底色，其真正悲悼的，是“我”逝去的童年情感与乡村生活。

钱浩的小说《姐》讲述一对姐妹的成长故事，在命运起伏外，小说设置了“大胃”“时间伯伯”等意象，让人物生活在画家的作品中。这种近似元小说的安排，主动暴露了叙事者的主体存在，以写作行为的物质性表现作家与作品的情感连接。郑彭翰的小说《台风天》以小杰参加父辈葬礼为叙事起点，看似是一个表现亲情和死亡的故事，实则暗藏独特的身份视角。逝者是小杰父亲的哥哥，这种疏离的关系使小杰感到隔阂。作者无意提供惯常的情感抚慰，而是执意拷问少年内心的孤独与不安，并探求背后的生活成因。故事结尾，一场台风来临，狂暴的自然意象并未导向和解与救赎，反而是主角内心混沌与冲突的外化。与之类似，毛焯希的小说《生如草芥》开篇讲述苇苇的命运起伏及其与母亲的争执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又遇到一个男人，这使得成家生子的苇苇与母亲心生隔阂。继父的病掏空了家里的积蓄，苇苇帮忙照料，母亲却一味索取。这时，此前积蓄的矛盾突然爆发，苇苇拒绝母亲和家人住在自己家里。小说没有走向意料之内的温情结局，女孩对母亲的复杂情感持续到文本结尾，在生活的窘况背后，是作者对何为亲情的追问。

我们通常把故事的完整、人物的立体视为小说的美德。但在这种成熟的写作中，作者主体被巧妙隐藏。写作不是一个自我解剖、与世界探讨的过程，而是一门打磨故事、指点社会的技艺。于是，叙事的完整性成为小说的商品价值。我们可以轻松地阅读命运、归纳道理，置身事外地哀叹或感怀，在合上故事封底的同时将其迅速消费。相反，这些尚显青涩的学生作品却诚实、真挚地站在生活面前，所有的故事都被引向自身，叙事的裂隙构成德勒兹意义上的“褶子”，以打开的姿态袒露写作与自我的情感关联。比如，董开鑫的《你要来一颗薄荷糖吗》就将人物的立体形象与沉重底色掩盖在轻松的文本之下，用一系列看似琐碎、无意义的片段表现男孩的校园生活。王以予的《镜》用对话结构全篇，主人公因在镜中看到一条鱼在脸上游荡，遂与朋友谈起音乐、善恶、生命，以及对往事的回想。对话贯穿文本始末，镜子的隐喻具化为语言在其中延宕，在看似凌乱的絮语中，一次次冲击自我意识的存在和意义。

在当代诸多优秀作家的笔下，我们已经看到小说未来的可能性。虚构的意涵正在被改写，无限向主体靠近，年轻的写作者用诚恳的自我表达寻找小说的意义，赋予这些作品直面生活、直面内心的真诚与勇气。于是，写作回归到最朴素的本位，成为福柯意义上的“自我技术”，如同一个无法接受世界本就如此的孩子，执拗于他的善良和诚实，用文字寻找认真生活的可能。

(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)